

ШКОЛА КОНФУЦІЯ КИЇВСЬКОГО УНІВЕРСИТЕТУ імені БОРИСА ГРІНЧЕНКА

兰州大学 王希隆 (Ван Сілуи),
Університет Ланьчжоу, Китай

儒学传入欧俄及其与宗教的区别 兰州大学 王希隆 (ОЗНАЙОМЛЕННЯ ЄВРОПИ ТА РОСІЇ З КОНФУЦІАНСЬКИМ ВЧЕННЯМ І ВІДМІННОСТІ ОСТАННЬОГО ВІД ІНШИХ РЕЛІГІЙНИХ ВЧЕНЬ)

В статті професора Ван Сілуна йдеться про перші контакти китайської культури з західною та російською культурами (XVII–XIX ст.), зокрема, ознайомлення російських та європейських дослідників з текстами конфуціанських, історичних та філософських пам'яток класичного Китаю. Автор статті знайомить читача з такими постатями в історії Китаєзнавства, як Іларіона Каліновича Разсохіна, Алексея Леонтевича Леонтеєва, Нікиту Яковлевича Бичуріна. Певна частина статті присвячена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ці конфуціанства як релігійно-філософської системи у зіставленні її з іншими китайськими та світовими релігійними й філософськими системами, а також розвитку конфуціанства в сучасному Китаї.

Дана стаття є комплексним бібліографічно-енциклопедичним дослідженням, яке може зацікавити синологів, дослідників конфуціанської культури та китайської цивілізації.

十七世纪中期，中俄在黑龙江流域不断发生军事冲突，一些被清军俘虏、招降或主动投诚清朝的哥萨克被陆续送至北京。仅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送至北京的俄罗斯人就有31名。

¹至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北京的俄罗斯人已有近百名，他们被编入满洲镶黄旗第四参领第17佐领，称为“俄罗斯百人队”。由于他们大多来自雅克萨，俄国史籍中又将其称为“阿尔巴津人”。这是自元朝之后，定居于中国的俄罗斯人又一次在中国正规军队中服务。这批俄罗斯人居住于北京城东北角胡家圈胡同镶黄旗驻地，

²清朝给他们提供住房、衣食，发给年俸，并帮助他们娶妻安家，允许他们信仰自由。“总之，康熙皇帝赐给了阿尔巴津人一切宽厚待遇。”

³作为东正教徒，“他们来北京时，携带了教堂的圣像供奉于康熙帝下令赐给的一所庙宇中，把庙宇改为东正教教堂，由祭祀马克西姆·列昂节夫主持教堂事

¹ 《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中译本，第56页。

² 俞正燮：《癸巳类稿》，卷9。

³ 尼·伊·维谢洛夫斯基编：《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第1册，中译本，第26页。

务。这所教堂被称为“圣尼古拉教堂”，

¹，也被称作俄罗斯“北馆”。由于定居北京的俄罗斯人多娶中国妇女为妻，受她们的影响，北京俄罗斯人的宗教观念日益淡薄，按教规生活的人并不多。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俄国商队频繁来京贸易，圣尼古拉教堂又成为商队人员宗教生活的场所。“到北京来的俄国商队的全体人员都要到圣尼古拉像前作祈祷”。

²通过俄国商队，列昂节夫与主管西伯利亚教务的托博尔斯克大主教伊格纳思取得了联系。1695年（康熙三十四年），伊格纳思给列昂节夫送来教会证书，将北京的小教堂正式命名为“圣尼古拉教堂”，

³并命列昂节夫将儿子送到托博尔斯克去接受教会执事的圣职。⁴

俄国政府和教会对列昂节夫在北京的活动十分重视。列昂节夫死后，北京圣尼古拉教堂很长时间没有司祭。

⁵俄国来华国家商队根据政府指示，请求清朝同意俄国派传教士来京。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清朝派出的图理琛使团借道俄国赴伏尔加河流域报聘土尔扈特部。1714年，使团返回，途径托博尔斯克时，根据康熙帝的旨意，与托博尔斯克大主教指派的修士大司祭伊拉里昂（旧译为依腊离宛）等人会合，一同前往北京。⁶

修士大司祭伊拉里昂及司祭拉夫连季、辅祭菲利蒙等10人是由俄国政府和教会派往北京的第一个“北京传教士团”（或译“北京传道团”）。这批传教士居于北京圣尼古拉教堂，受到清朝的礼遇。伊拉里昂在北京生活了九个半月就病逝了。彼得大帝得知这一消息后，谕令东正教最高会议选派一名地位高于修士大司祭的主教接替伊拉里昂。东正教最高会议选派了英诺森·库利奇茨基主教。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库利奇茨基主教率传教士团到达色楞格斯克，此时正值中俄关系恶化，清朝宣布停止库伦、北京的中俄贸易之际，库利奇茨基收到理藩院的信函，“信中说在有关中俄两国的私逃者和边界等悬案没有得到解决之前，不允许主教进入北京”。⁷

1728年（雍正六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根据条约第五条规定，清朝协助俄国在北京建立一座东正教堂。这座教堂建于北京东江米巷（后改称东交民巷）俄罗斯馆内，命名为“奉献节教堂”。

⁸与称为“北馆”的“圣尼古拉教堂”

⁹对应，“奉献节教堂”又称为“南馆”。条约第五条还规定，俄国定期向北京

¹ 这座教堂又称为索菲亚教堂、圣母安息教堂。

² 《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第1册，中译本，第27页。

³ 《沙俄侵华史》，第1卷，第273页。

⁴ 《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中译本，第265页。

⁵ 《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第1册，中译本，第32页。

⁶ 1715年4月30日抵北京。

⁷ 《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中译本，第266页。

⁸ 《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第1册，中译本，第42页。

⁹ 1730年北京地震，圣尼古拉教堂毁坏，1732年重建。

派遣传教士团和留学生，到京后居住于南馆，传教士团由清朝“供以膳食”，留学生由俄国“供其膳费”。

¹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俄国定期派遣传教士和留学生来北京传教与学习，对于中俄文化交流的发展及儒学传入欧俄地区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俄国正式设立驻华使馆之前，至1860年（咸丰十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俄国派驻北京的传教士团共有十四届。²这些传教士、留学生是欧俄地区汉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经过在北京长时期的刻苦学习，他们中有不少人精通满、汉、藏、蒙文，熟知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文化，他们为儒学文化在俄国的传播作出了贡献。比较著名的代表人物有：

伊拉里昂·罗索欣（1717-1761），又译赫拉尼·罗索金，布里雅特蒙古人，出生于色楞格斯克一神父家庭。原为伊拉库茨克主升天修道院附设的蒙文学校学生，1729年（雍正七年）被选作留学生随第二届传教士团到达北京，1740年（乾隆五年）随俄国心术绍库罗夫返回俄国。罗索欣在北京学习了11年，他本会蒙文，又进一步掌握了满文、汉文，在当时北京俄国留学生中学习最为出色。自1735年起，他在理藩院任翻译，并在内阁俄罗斯馆教俄语，编译过《俄罗斯翻译捷要全书》。1741年回到彼得堡，被任命为汉文和满文译员、东方语言教授，负责翻译外交公文并为彼得堡卫戍部队子弟学校培训汉语和满语翻译人员。罗索欣翻译和编译了近30部中国书籍，其中包括图理琛的《异域录》及《资治通鉴纲目前编》、《中国丝织厂资料》、《一七三〇京报摘抄》，并与另一留学生列昂季耶夫合译了《八旗通志》。

阿列克谢·列昂季耶夫（1716-1786），又译阿列克谢·列昂节夫。愿为莫斯科神学院学生，曾随俄籍中国人渣加学习满文。1743年随俄国信使绍库罗夫到达北京，1755年随弗拉迪金商队返回俄国，在北京学习了12年。列昂季耶夫回国后，被分配到外务委员会担任翻译。恰克图第一次闭关后，他曾担任俄国全权代表克罗波托夫的秘书，与清朝代表瑚图阿灵、庆桂等举行谈判，于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签订了《关于俄中边界制度的恰克图条约补充条款》，使恰克图贸易得以重开。列昂季耶夫也翻译了大批中国书籍。1762年，他将罗索欣未译完的《八旗通志》补译完成，受到俄国政府的奖励。随后又陆续译出《大清会典》、《名臣奏议》、《图理琛异域录》、《大学》、《中庸》、《圣贤格言》、《三字经·名贤集合刊本》。他还按照叶卡捷琳娜二世选译中国律令的指示，译出《大清律集解附例》和《雍正二年谕旨》，提供整饬吏治和敦化民风的借鉴。列昂季耶夫翻译的著作约25部，许多是欧洲第一次译本，并由大量注释。他发表了《中国臣子》、《中国君子》等文，宣传儒家学说中修身治国的思想，还编纂了一些汉满俄文辞典。

雅金夫·比丘林（1777-

¹ 《中俄边界条约》，第15页。

² 以下据《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第1册。

1853），又译俾丘林。原是喀山神学校学生，毕业后留校任训导教师，后在伊尔库茨克神学校和托博尔斯克伊万修道院任教与修道。1808年（嘉庆十三年）出任第九届北京传教士团团长、修士大司祭来到北京，1821年（道光元年）返回俄国。比丘林在北京留居了13年，他热爱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学文化。他经常身着中国服饰，深入北京社会，观察了解民情风俗。经过刻苦学习，他精通满、汉、藏、蒙文。在京期间他译著的书就有《北京志》、《准噶尔志》、《成吉思系前四汗本纪》、《蒙古志》、《西藏志》、《中亚诸民族志》、《西藏青海史》等17种。比丘林在北京广为搜求汉、蒙、藏、满文书籍和各类文物，回国时，他带走了几吨重的中国书籍，包括《十三经》、《廿三史》、《大清一统志》及各种地图。他带回的书籍数量，超过了前八届传教士团带回的书籍的总和。他自称在北京13年所做的事情要比以往传教士团取得的总成就多出了五倍以上。比丘林返回俄国后曾长期在外交部亚洲司任翻译，继续从事汉学研究。他把《四书》及其全部注释译为俄文，并把《三字经》译为俄文，称之为“十二世纪的百科全书”。他还把自己的汉学著作《西藏青海史》、《卫拉特或卡尔梅克历史概述》、《中华帝国详志》、《中国的国情与民风》、《中亚各族史料汇编》等陆续刊布。为此，他先后三次获得科学院的杰米多夫奖，成为当时俄国汉学界的权威，被称为一代宗师。

瓦西里帕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1818-1900），又译王西里、瓦习礼、王书生。原为喀山大学硕士，其硕士论文题目为《论佛教哲学的原理》。1840年（道光二十年）随第十二届传教士团来京，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回国。在京期间深入研究佛学，将《大唐西域记》译为俄文。瓦西里回国后先任喀山大学教授，后调任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教授，从事汉、满文教学。他担任东方学系主任15年之久，1886年当选为科学院院士，并一度兼任外交部亚洲司翻译。他的著作有《东方的宗教：孔教、佛教和道教》、《佛教教义及其历史和文献》、《回教在中国的传布》、《中国的发现》等。他将《满洲志》、《宁古塔纪略》、《论语》等书译为俄文，还将《聊斋志异》中的一些故事及唐人小说《李娃传》译为俄文，并编纂了《满俄大辞典》。他被称为比丘林之后最大的汉学权威。瓦西里时期，俄国汉学中心，已从北京俄罗斯馆转移到了彼得堡大学。

帕拉季·卡法罗夫（1817-1878），又译巴拉第。原为彼得堡神学院学生，1840年作为第十二届传教士团的修士辅祭来到北京，后又出任第十三届（1849-1859）和第十五届（1865-1878）传教士团团长、修士大司祭，在北京居留达三十余年。他任修士辅祭时，就已通读汉文佛藏750卷，写成《佛陀传》、《古代佛教史纲》。以后又致力于中国边疆历史地理的研究，代表作有《元朝秘史译注》、《长春真人西游记译注》、《圣武亲征录译注》、《乌苏里边区历史概要》等。¹

¹ 参见《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第1册，中译本：《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中译本；蔡鸿生《评俄国“汉学”》载《中俄关系史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79年；米镇波、苏全有《清代俄国来华留学社工问题初探》，载《清史研究》94年1期。

除了传教士之外，出于外交活动的需要，俄国派遣留学生来京学习满文、汉文，《清史稿·选举志》载：“雍正六年，俄罗斯遣官学生鲁喀等留学中国，以满、汉助教等教之，月给银米器物，学成遣归，先后络绎至”。其实，第一批留学生卢卡·沃耶伊科夫等3人是1727年（雍正五年）到北京的。

¹据统计，1860年以前，俄国派往北京的留学生共计41人，

²其中，1754年（乾隆十九年）随弗拉迪金商队到京的瓦维拉·耶尔莫拉耶夫等4人，因清朝不予接受，于次年随商队回国。

³起初，俄国政府规定，派往北京的留学生，“自他们到达北京之日算起，学习期限为十二年，期满后即行返回俄国”。

⁴1840年以后，“因喇嘛学生等俱有父母在家思念情切”，改为五年为期。此外，随传教士团来京的还有医士8名，画家3名，硕士1名。⁵

俄国传教士，留学生们不仅为中国文化在俄国的传播做出了贡献，为俄国汉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他们也为俄国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一定的贡献。

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两国交往不断，公文信函增多。清朝出于翻译俄国往来公函的需要，在北京设立“俄罗斯学（又称俄罗斯文馆）”，“学生额二十四名，由八旗学生挑取”。俄罗斯学学生主要学习拉丁文和俄文。拉丁文由在京耶稣会传教士教授；俄文“设教习二人，将俄罗斯佐领下库锡玛、雅稿挑取”。后来，“俄罗斯佐领下无堪充教习之人，”遂选取学习俄文成绩优秀的学生充任教习。后又订立章程，学生“五年一考，列一等者作八品，二等者作九品。教习缺出，即以考授八品官学生奏请补充，候陞主事。以学生优劣，定教习黜陟，归内阁理藩院管理。”

⁶早期俄罗斯学培养出了我国第一代俄文翻译人才，他们为中俄外交作出了贡献。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由他们充当俄罗斯教习，俄罗斯学的师资力量显然不强。为了提高中国学生俄文水平，《恰克图条约》签订之前，清朝即已开始从俄国传教士中聘请教习。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到京的第一届传教士团中的修士司祭拉夫连季·乌瓦罗夫，就曾担任过俄罗斯学教习，康熙帝给其官员品秩，使他“享有当地官员的一切待遇”。

⁷教堂辅助人员约阿萨夫也“在蒙古衙门设立的俄语学校里教课”。

⁸《恰克图条约》签订后，俄国留学生陆续来京，他们中有不少人在学习期间被清朝聘为理藩院的翻译和俄罗斯学的教习。随第二届传教士团来京的留学生伊拉里昂《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第1册，中译本，第60页。罗索欣，从173

¹ 见《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第1册，中译本，第122页。

² 见上书及《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中译本，第285、294页。

³ 《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中译本，第293-294页。

⁴ 《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中译本，第292页。

⁵ 《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第1册，中译本，第127-128页。

⁶ 《清高宗实录》，卷539。

⁷ 《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第1册，中译本，第60页。

⁸ 《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第1册，中译本，第106页。

5年起任理藩院翻译并兼俄罗斯学教习。出于教学的需要，罗索欣编译了译本《俄罗斯翻译捷要全书》，这是中国学生使用的第一部俄语教科书。

¹俄国传教士和留学生来京时，还带来了许多俄文书籍，其中数量最多的一次是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拾年，俄国来文请求清朝赠送一部佛教经典《丹珠尔经》，道光帝命将雍和宫藏本八百余册赠与。“越数月，其国王因肄业换班学生进京，乃尽缮俄罗斯所有书籍来献。凡三百五十七号，每号为一帙，装饰甚华，有书有图，惟通体皆俄罗斯字，人不尽识”。道光帝令收存于理藩院，以待日后翻译。按军机处存贮档册例，这批书籍的书名先被译出，“好事者争相传录”。刑部主事何秋涛称：“其中言彼国史事、地理、武备、算法之书十之五，医药、种树之书十之二、字学、训解之书十之二，其天主教与夫诗文等类仅十之二而已”。²

来到中国的东正教传教士和留学生，要与当时中国的社会上层和知识分子们打交道，就必须懂得以儒学为中心的思想与行为规范准则，而当时中国人的学习是由浅及深从《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著作入手的。东正教传教士与留学生是中国文化在欧俄地区的传播的先行者。这首先是由于传教士与留学生们他们接触到中国的儒学之后，深深地为以仁为核心体系的儒学所吸引，对儒家的价值观、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穿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服装，甚至给自己起了儒雅的中国名字。比丘林在北京时经常身着中国服饰，与中国知识分子进行交往。瓦西里耶夫在北京时以瓦习礼、王书生的名字为中国知识分子和达官显贵所熟知。

早期的东正教传教士和留学生们把大量的儒家经典著作翻译为俄文。如上所述，阿列克谢·列昂季耶夫译出了清朝的《名臣奏议》、《大学》、《中庸》、《圣贤格言》、《三字经·名贤集合刊本》等。他还按照叶卡捷琳娜二世选译中国律令的指示，译出《大清律集解附例》和《雍正二年谕旨》，提供整饬吏治和敦化民风的借鉴。他翻译的著作约25部，许多是欧洲第一次译本，并有大量注释。他发表了《中国臣子》、《中国君子》等文，宣传儒家学说中修身治国的思想，还编纂了一些汉满俄文辞典。比丘林回国时，带回的中国书籍中包括《十三经》、《廿三史》等。他回国后把《四书》及其全部注释译为俄文，并把《三字经》译为俄文，称之为“十二世纪的百科全书”。瓦西里耶夫的著作《东方的宗教：孔教、佛教和道教》是他在中国了解到儒释道三教并立的实际情况后撰写研究著作。早期东正教传教士和留学生们为中国文化在俄国的传播做出了贡献，为俄国汉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儒家学说在中国也称为儒教。正如瓦西里耶夫在中国学习期间所认识到的，中国人也把儒家学说称之为“孔教”、“儒教”，将其与佛教和道教并称为“三教”。但是，中国的儒学（儒教）与宗教有相同之处，也有很大的区别。

作为一种宗教，有其必备的几个条件。

首先，宗教有其膜拜的对象。一般来说，都是把宗教的创始人作为膜拜对

¹ 《评俄国“汉学”》。

² 《朔方备乘》，卷39。

象。如佛教的创始人乔答摩·悉达多，即佛祖释迦牟尼，为佛教的膜拜对象；基督教奉其创始人耶稣为膜拜对象；伊斯兰教奉其创始人穆罕默德为圣人，中国的道教，创始人为张天师，但奉老子为祖师。

其次，宗教有其经典著作。基督教有《圣经》；佛教有《大藏经》；伊斯兰教有《古兰经》、《圣训》；道教有《道藏》等。这些经典著作皆博大精深，内容涉及到各个方面。

再次，宗教内部多分派系，如基督教有天主教、新教、东正教三大派系，佛教有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等；伊斯兰教有逊尼派、什叶派两大派系；中国道教历史上又太平道、五斗米道、全真教等等。各宗教派系内又有多种派系，派系中又各皆有其组织系统。

第四，作为宗教，皆有其宗教活动的场所。如基督教之教堂，佛教之寺庙，伊斯兰教之清真寺，中国道教之道观等。这些场所不只是进行宗教活动，而且也是其文化教育中心，负有培养人才的职责。

应该说，中国儒学，也具备了以上宗教必备的条件。

儒学又称为儒教，《史记·游侠列传》载：“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儒教的创始人孔子被尊为万世师表，不仅是儒生们的膜拜对象，也是中国朝野上下尊崇的对象。因此，儒教又被称为“孔教”或“圣教”。

儒教有自己的经典著作，孔子在世时“治《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六经”，以后增编为《十三经》、《十三经注疏》，作为儒家学说的权威经典教科书。

儒教有自己培养教育传承学说的学府，起初学府由私人开办，如私塾、私学等。以后国家开办学府，府州县以致首都都开办学校，在读者称为诸生、监生等。同时，科举制度兴起，要致仕取得出身，必须从学习儒家经典入手，经过秀才、举人、进士等各等级的考试，才能致仕为宦。中国封建社会的学府，是学习儒家学说的场所，是培养人才的基地。

然而，儒教与宗教却有着一个根本的区别：即凡宗教必认为存在着超越自然的力量，相信现实世界之外存在着神秘力量或实体，神秘统摄万物而拥有绝对权威、主宰自然进化、决定人世命运，从而使人对神秘力量产生敬畏及崇拜，如基督教之上帝，伊斯兰教之安拉，佛教之佛祖菩萨等，他们具有超自然的力量，主宰自然界与人世间的一切。而儒教只是敬拜天地君亲师，对超自然力量的“神”，持不可知论，即“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表明了儒教对此的认识与立场。

应该指出，宗教与儒教都具有规范社会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在接触儒家学说之后，将儒学归之于中国的宗教，称之为儒教。